



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在放开“二胎”25年之后的山西翼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山西翼城：不为人知的二胎试验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来，由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向干部们讲解了在翼城试点“二胎”的办法。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这是他对梁中堂的描述。

尽管几乎所有的与会干部都同样“震惊”，这一年仍然成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转折年。在后来的25年中，这个偏远的农业县将悄然实行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放开“二胎”。

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无论是理论奠基者梁中堂，还是如冯才山一类的执行者，抑或是翼城试验本身，至今仍然少为人知：其经历少有公开报道；在计划生育30周年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与翼城试验有关的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是否与翼城的25年试点稍有关系。



从25年前开始，翼城人就可以有条件生育二胎。

胡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在梁中堂讲解试点办法的时候，翼城人并未意识到这将是给整个县城带来重大变化的开端。

作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冯才山很快加入了这场不许声张的全县人口试验之中，并见证了之后25年的变化。

在隆化镇，冯才山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计划生育舆论宣传。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

的工作举步维艰。

而在全国范围内，计生工作都迅速陷入一种微妙局势之中。1984年，中央专门下发7号文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在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

“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

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在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

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

重心。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他们又最不理解，因为所有政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两晚一间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

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翼城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

作为一个勇于探索的试点，翼城成为全国计生大棋盘上的一个特例。

事实上，翼城试验从一开始就仍然面临着计划生育指标的衡量——到2000年，全县人口不能超过30万。翼城并非是非计划生育年代的纯粹的桃花源。而落实这样的试点，不得不依赖于计生队伍的实际操作。也正因此，尽管实施着与外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使用同一套评价标准时，翼城县的计生经验同样领先，屡次被国家

计生委评为先进单位。

上世纪80年代，和翼城县同一时期一起试点人口政策的，还有辽宁省黑山县、黑龙江省黑河市、浙江省武义县、甘肃省酒泉地区等13个县市。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除了翼城县以外，其他生育二胎的试点全部被收回。

其他试点的天折使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计划生育试验中的“孤本”。

即使在允许农民生育二胎的翼城县，有时计划生育政策也会与

农民个人的计划有矛盾。这时候流产、上环和绝育就成为必须。

对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而言，试点让工作不再那么被动，但工作量却依然巨大。如何控制好晚婚、晚育和二胎间隔，都成为挑战。和外界介绍的“人口特区”不同，现在看来，翼城的试点更像一个极为保守的妥协方案。这里并不是人们想像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一位计生工作负责人甚至认为：恰恰因为二胎试点，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计生

措施实施得更加严格而精细。

在那个流行“承包”的年代，计生任务指标承包的创新方法被运用起来。

“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规律，这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模式是什么，就决定了人家自觉地生几个孩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认为，25年过去了，伴随着国内数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一、二孩生育间隔限制的取消，翼城县的试点生育政策模式已经错过了推广时机。

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

即使在社会经济发展并不很快的翼城县，现代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取代了以往观念。在记者于西贺水村的随机入户调查中，大部分家庭表示抚养二胎是极限，一胎更适合。

“即使计划生育政策取消了，谁也不会再多生几个，因为从经济角度考虑抚养孩子越来越不容易。”

“以前集体吃大锅饭的时候，多个孩子不就是多副碗筷嘛，现在孩子抚养负担很大，一个男孩结婚盖房就要20万以上，从小养到成婚，没有100万肯定不行。生多了养不起，少生反而可以快富。”冯才山说，“如果说现在翼

城的政策有什么地方可以进一步改进的话，就是可以取消晚育的要求，更多地让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人们的生育行为。”“以前人们拼命生，现在很多人又不愿意生。让人们自由生育就可以了。”梁中堂说。

25年的试点，随着无可阻挡的社会进程，轻易实现了人们的自发少生晚育。这印证了梁中堂最初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翼城试点的“自动失效”却恰是翼城试点得出的最重要结论。

在试点25年之后的今天，翼城县的人口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也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1982-2000年的两次



专家称，明年五省试点放开生二胎。

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117.8%，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5.5%，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山西翼城用25年的时间证明了放开二胎不会导致人口暴涨。南方周末